

第三卷

毛泽东

傳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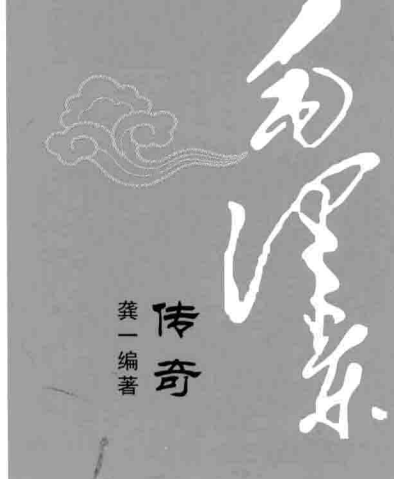


龚一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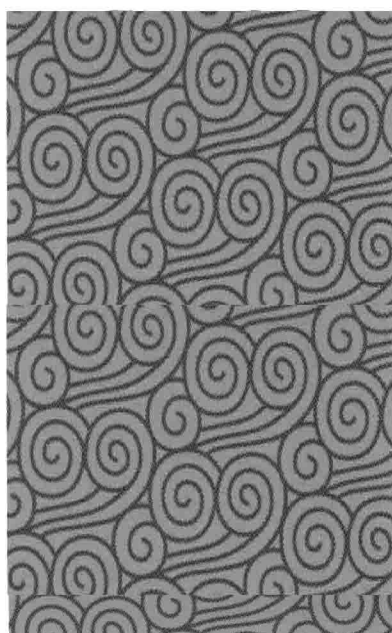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编委会

○顾 问 李 敏 李 讷 王景清 毛小青
魏光朗 莫 骄 胡子敬 李定坤
○总 策 划 胡国安 匡卫兵 张建辉 李 锐
邹立伟 肖 彦 帅 兵 曾馨逸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毛泽东传奇 / 龚一 编著. -- 北京 : 中共中

央党校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035-5223-6

I. ①毛… II. ①龚… III. ①毛泽东 (1893~1976)

- 生平事迹 IV. ①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0582号

毛泽东传奇

责任编辑 王 君 蔡锐华 任 丽

装帧设计 文卫民

责任印制 王洪霞

责任校对 马 晶

策划统筹 湖南凤凰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 编 100091

网 址 www.dxcbs.net

电 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热线 (0731) 88238222

字 数 1800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一版 2014年1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 张 23.5

全套定价 98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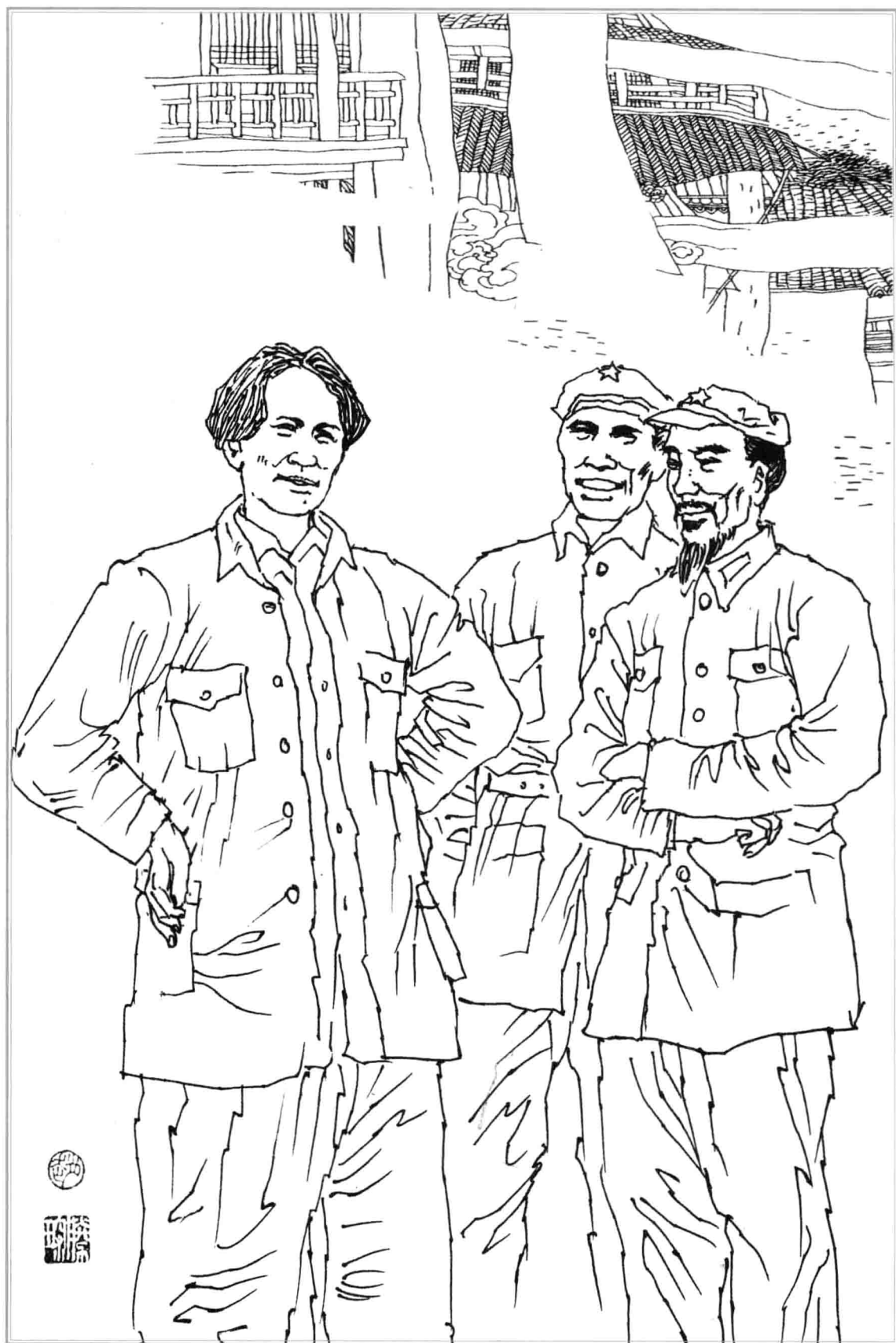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本书图片全部由毛小青女士提供)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第三卷

第一部用章回故事记录毛泽东传奇一生的作品





目 录

第四十章	忍辱负重转攻漳州	横加迫害休养长汀	2
第四十一章	反围剿博古瞎指挥	重视察会昌稳局面	18
第四十二章	大撤退泪别根据地	失良机血溅湘江河	36
第四十三章	过老山界确定西进	驻遵义城挽救红军	54
第四十四章	毛泽东神机走赤水	贺子珍分娩送骨肉	80
第四十五章	出奇兵连战连捷报	施妙招再渡再辉煌	96
第四十六章	蒋介石无奈听摆布	毛泽东诈兵过金沙	110
第四十七章	刘伯承结盟小叶丹	众勇士血染铁索桥	122
第四十八章	翻越夹金山大会师	较量两河口出分歧	132
第四十九章	张国焘沙窝死要权	徐向前包座诚请战	150
第五十章	闹分裂张国焘南下	脱危险毛泽东北上	166
第五十一章	腊子口鲁大昌无能	吴起镇彭德怀横枪	184
第五十二章	习仲勋险些遭活埋	林育英精诚谋团结	202
第五十三章	主抗日东进唤民众	力讨匪西寻求发展	222
第五十四章	冒危险进入陕甘宁	反分裂会师将台堡	240
第五十五章	共产党保安办红大	毛泽覃瑞金传噩耗	260

第五十六章	毛泽民上海保巨款	盛世才新疆称霸王	272
第五十七章	抗日救亡延安谋和	内战在即张杨兵谏	300
第五十八章	贺子珍坚持上红大	许世友诚恳跪主席	318
第五十九章	卢沟桥中华猛惊醒	陕甘宁洛川定方针	334
第六十章	运动战众将生反思	新四军叶挺挑重担	356

【第四十章】

忍辱负重转攻漳州
横加迫害休养长汀

40



第四十章 忍辱负重转攻漳州 横加迫害休养长汀

话说项英骑马从瑞金赶到东华山，告诉毛泽东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红军已处在腹背受敌的境地，并把前线发来的急电交给他。中革军委的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

毛泽东立刻带着警卫班下山，冒着风雨赶回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提议大胆起用起义才两个月、原来被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当晚，他又从瑞金出发，日夜兼程，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朱德告诉毛泽东：“按照你的意见，已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在红四军支援下，使红三军团脱出险境。”

中央红军这次攻打赣州历时三十三天，城未攻下，伤亡达三千多人。毛泽东到前线指挥部后，经过调查，提议苏区中央局在前线召开会议，讨论打赣州的经验教训和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1932年3月中旬，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赣县江口举行。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攻打赣州是错误的，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他这种主张，是要转入外线的进攻作战，以“出击求巩固”。

但另一些人就是那么傻，失败的铁的事实面前就是不低头，一味的认为，红军攻打赣州是依据中央和中央局的决议，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虽从赣州撤围，并不是不再打赣州了；红军还是要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要夺取中心城市的，主张红军开到湖南去。会议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也没有把部队开到湖南去，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分率中路军北上。朱德1964年2月9日曾赋诗《经闽西感怀》，对毛泽东这次意见遭受否决表示惋惜：“不听仙人指，寻求武夷巅。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赣闽成一片，直到杭州湾。出击求巩固，灭敌在此间。”这是后话。

当时，福建是国民党军事力量的薄弱环节，除张贞的第四十九师外都是地方保安部队。闽西的红十二军刚占领了上杭、武平两县，守城的地方部队被击溃后退往广东。毛泽东依据闽西敌情发生的变化，主张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向闽西。他在率领红一军团北上宁都集

中的途中，向军团领导人林彪和聂荣臻阐述中路军向闽西发展的主张，并得到他们的赞同。林、聂在1932年3月21日向中革军委报告：“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见。日前粤方开始派兵入闽赣讨赤情形下，更应采毛主席意见。”红一军团随即进抵闽西长汀待命。

1932年3月27日和28日，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同意由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领东路军攻打闽西的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这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会后，毛泽东赶到长汀。他向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东征动员时，指出：“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应该看到我们中央根据地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果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如向南发展，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为有利，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还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因此，中央局决定由我带领东路军，打到外线去，打到闽南去，发展根据地，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资补给。”

在长汀进一步了解福建境内情况后，毛泽东在30日又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远离根据地，“直下漳州”。电文说：

“恩来同志：（一）电悉。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二）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一军团及七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三）粤敌从大埔到龙岩胁我后路只须五天；五军团从信丰到龙岩须十五天，故若待已知粤敌入闽，然后调动，必迟不及。（四）一军团已开至汀东之新桥休息，以乱敌探耳目，候七师取齐，即先向东行。五军团可随后入闽，但至迟四月二十日须到达龙岩待命。十三军亦须入闽，位于龙岩坎市，保障后路。现一军团前进，后路完全空虚，七师望催兼程来汀，若七师不取齐，一军团下漳州更单薄。（五）我明日去旧县晤谭（震林）、张（鼎丞）。泽东 西三十日。”

对攻打漳州，有些人很有顾虑：惧怕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后整个根据地被占。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刻从瑞金赶到长汀，在4月1日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这次战役的政治意义。他还说明：“中央红军进攻漳州的任务是消灭张贞师，收缴军事物资，帮助当地开展游击战争。任务完成后，就回师中央苏区，并不是要长期占领漳州。”会议又听取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随即批准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

为了组织好这次战役，毛泽东在会后带警卫排星夜从汀江坐船赶往上杭。望着这滚滚的江面和乌云密布的夜空，不少人为毛泽东的安全着急。

“老人家！我们顺流而下，正用得着大风大浪。当年，诸葛亮费了多大的劲，才借来了东风啊！今天，我们不必登上七星坛，风就来了，这还不是个便宜事儿？您就放心大胆地开船好罗！”毛泽东似乎胸有成竹，很风趣地一字一板地对老船工说。

夜空里，突然间飞来两响刺耳的枪声。紧接着，西岸大山的悬崖之上，也打过两声冷枪，好像在回答对方的问讯。看着这个情景，大家都知道进入了被红军打散的敌军残部的封锁线了，便立刻掏出驳壳枪来，把身子贴伏在船沿上，做着应付一切意外的战斗准备。并且

在船上仅有的这一小块地方，给毛泽东和随行的陆定一做好了掩护。可是，毛泽东非常镇静，他让大家爱把枪收起来，然后才不慌不忙地低声说：“敌人打冷枪是搜索情况，我们只装作没听见。这样就是胜利。不要忘记，我们今晚只唱‘借东风’，不唱‘草船借箭’。留着这伙残敌，让我们的赤卫队去收拾好了！”大家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神机妙算，说说笑笑地到了上杭。

毛泽东一到上杭，经过调查，又致电周恩来：

“敌一部既入闽，我直捣漳泉部队必须更迅速更集中，否则敌占先着，我军将进退维谷。五军团全部必须立即出发，取直径急行军……于14日到龙岩。”

“中央局、军委宜移长汀。”

4月10日拂晓，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乘敌不备，向龙岩发起进攻，消灭守军张贞部近两个团，在下午攻占龙岩城。第二天，他致电周恩来，报告在龙岩取胜的原因，说明将在这里休整两天，待主力会合后，“即直下漳州”。并指出：“目前粤敌是对江西取攻势，对福建取守势。但我军入漳，必能诱动该敌。”

根据中革军委的紧急命令，红五军团昼夜兼程，在14日如期到达龙岩，同红一军团会合。毛泽东立刻以红五军团第十三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从龙岩到漳州的供应线，第三军随红一军团南下进攻漳州。

漳州虽是闽南重镇，地处九龙江的入海口，交通便利，贸易发达，但地势平坦，没有城墙，易攻难守。张贞部第四十九师两个旅和一些地方部队约一万人，孤立无援，主要依托漳州西北的天宝山一带外围丘陵地区进行防御。

红军经过实地调查，在4月19日拂晓，对漳州外围守军发起进攻，迅速突破守军主要阵地，向纵深方向扩展。张贞见屏障尽失，大势已去，连夜烧毁军械库，弃城而逃。20日，战斗胜利结束，红军占领漳州城。

漳州战役中，红军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大部，俘虏副旅长以下官兵1674人，缴获各种枪2100余支、各种炮6门、子弹13万发、炮弹4900发、无线电台一部，还缴得飞机两架，其中一架能飞，红军曾用它飞到厦门上空散发传单。这一次胜利影响很大。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南靖一线，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

入城第二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东路军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布置入城后的任务，主要是：收集战利品；搜查反革命分子；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政策，分发谷物给群众，扩大红军政治影响；向地主豪绅筹款；严格执行入城纪律，维持革命秩序。

22日下午，毛泽东又向东路军总部、红三军、红四军的连以上干部作报告。他风趣地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

红军是在农村中成长壮大起来的，进了漳州这样的城市后对什么都感到新奇。尽管毛泽

东已估计到有人会把农村斗争的一套搬到城市中来，进城时就要求指战员严格执行党的城市政策，注意群众纪律，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头一次打下了漳州这样的城市，谁是土豪？开始，看是戴礼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镜、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当土豪。有个团就抓了一百多个。类似这些问题，其他部队几乎都有发生。毛泽东发现后，在他的住地，原漳州省立第三中学即现在龙溪地委机关内那座小楼门前的草坪上，召集了一个连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干部会。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很多话，其中最主要的是说打土豪，你们打错了很多，有的不是土豪，属于华侨。（那时规定一条，不没收商店、不没收华侨资本家的商店，但可以要他们捐款。）

毛泽东说：“你们为什么搞错？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没有认真地很好地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有人说，听不懂本地话，越是不懂话，就越要调查研究。”

杨成武的团抓了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只有五六个是土豪，其他都不是，就给他们赔礼道歉，请吃饭，然后都放了。在进漳州的路上，看到一些香蕉、甘蔗，以为是资本家的，给吃了，也都统统赔了钱。这样，党的政策就贯彻得很好了，留下的影响很好，群众同红军的关系就密切起来。

毛泽东在漳州规定的城市政策，比一年多前打开吉安时规定的政策更加完善了：强调商店照常营业；对一般工商业通过商会向他们筹款。陈嘉庚先生在漳州开有一座商店，派了他的款，他开始不交。红军只是派人进入他的商店，取走相当于所派款项的罐头、胶鞋等给部队吃用，仍令其继续营业。

毛泽东在漳州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搜集到一大批书籍和报刊，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著作。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毛泽东不但自己读，有几本书还推荐给其他领导人看。

东路军在漳州停留了49天，发动群众，筹集了款项一百多万元，动员了近千群众参加红军，还调拨几百支枪给闽南游击队，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

正当毛泽东率东路军进攻龙岩、漳州的时候，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在4月11日向临时中央常委会报告了中央局在赣南会议前后的情况。项英刚讲到中央区“狭隘经验论障碍新路线的执行”，一个中央常委就插话说：“中央区的领导，我以为对于目前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民粹派的观点，是离开布尔什维克的认识的。中央区是以为目前的革命是农民或贫民的革命（虽然没有文件上表示出来），这是与国际指出目前是民主的革命工农专政、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意义是原则上的不同。这在土地问题上、党的问题上、职工决议上、反帝问题上都表现出来。因此，中央区的领导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另一个常委又说：“狭隘的经验论，毋宁说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他们的意思是说：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提到反对“机会主义”的路线高度。会后，临时中央连续在4月14日和5月20日发出文件严厉批评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

项英带着临时中央的批评意见，从上海回到中央苏区。中共苏区中央局已收到临时中央

4月14日的指示信，又提前知道了中央5月20日指示电中批评“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一面准备接受中央批评，一面将临时中央四月指示信的精神电告正在前线的毛泽东：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箭在弦上；国民党政府“正在积极的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作全线的新的总进攻”；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争斗；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

毛泽东接到来电后，断然认为：临时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党的任务的规定和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判断，是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的。他在5月3日复电苏区中央局：

电悉。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

第一、三次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

第二、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转移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行动。

苏区中央局没有能像毛泽东那样坚决顶住来自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错误批评。5月11日，中央局在长汀作出决议说：“目前事变的发展，更加证明了国际与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确与中央局估量的绝对错误。”中央局承认“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表示要“彻底纠正”这种“错误”。

这时，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开始了。他们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企图得手后再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六月初，在中央苏区的周围，国民党集中了四十个师以上的兵力，粤军已向北进攻赣南。毛泽东率东路军撤离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

毛泽东回到长汀，看见苏区中央局5月11日的决议，十分不满，而这个决议是在他没有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犹如“一审终结，不许上诉。”

东路军回师后，红军编制作了调整，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辖红一、红三、红五这三个军团，由朱德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没有恢复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仍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分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

在赣南前线，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关于“解决入赣敌军”的意图，组织了南雄、水口战役。7月上旬在赣南、粤北的南雄、水口等地击溃粤军十五个团，使入侵赣南的粤军退回南雄，但这次战役由于兵力不够集中，没有能大量地歼灭敌人，红军自身的伤亡也相当大，只打成一个击溃战。

7月21日，周恩来作为苏区中央局代表赶到前线。后方工作由中央局副书记任弼时和临

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主持。鉴于中央局提议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联名致电后方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但中央局仍坚持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再次写信向中央局进一步陈述：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信中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8月上旬，毛泽东在兴国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主张设在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会议经过争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外线作战要在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的地区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的国民党军队，再打由赣江以西或由南城、南丰等地前来的援军，进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临川），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反“围剿”斗争。这次中央局会议决定，在前方组成由周恩来任主席，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成员的最高军事会议，负责决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会后，中革军委正式发布命令，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中革军委根据兴国会议精神，在8月8日下达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领红一方面军佯作向西行动以迷惑对方，主力却秘密北上，经过一星期的急行军，到达乐安附近，对方还没有察觉。

8月15日，毛泽东、朱德签发训令，突然向乐安县城发起攻击。17日，攻克乐安。20日攻克宜黄。23日又乘胜占领南丰。

乐安、宜黄战役是成功的。这一仗，行动隐蔽，出敌不意，速战速决，各个击破，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俘虏五千多人，缴获长短枪四千余支以及一批军用物资，创造了在一周内连克三座县城的成绩，直接援助了鄂豫皖与湘鄂西两苏区和红军的反“围剿”作战。

乐宜战役取得胜利后，下一步如何行动？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和在后方的成员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毛、朱、王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按照苏区中央局原定计划向国民党军队重兵集结的地区推进——西取吉安或北攻抚州，而是挥师东进，攻打南城，准备打开赣东局面。当红一方面军主力进抵南城近郊时，发现国民党军队已在这里集中三个师准备固守，并有援军赶来，当地地形也不利于红军作战。周、毛、朱、王立刻当机立断地改变攻打南城的计划，将红军主力退却到根据地内的东韶、洛口，随后又撤至宁都以北的青塘一带休整，寻求战机。

可是，在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领导人不同意前方的布置，批评他们在撤围南城后，“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撤退东（韶）洛（口）”，“再撤退宁都青塘待敌前进，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决定”，“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良影响”。他们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威胁南昌，以减轻“围剿”军对鄂豫皖、

湘鄂西等苏区的压力。在前方的周、毛、朱、王9月23日复电苏区中央局，明确指出：“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相隔一天，苏区中央局再电周、毛、朱、王，说：“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群众条件来消灭敌军”，“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同日，周、毛、朱、王致电苏区中央局，坚持原定作战计划，并强调指出：“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毛泽东、朱德根据前方最高军事会议的决定，在26日发出红一方面军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这是一个符合前线实际情况的正确决策。

苏区中央局对红一方面军这个训令十分生气，又收到临时中央7月21日长信和九月下旬要求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的指示电，就致电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局全体会议。”

10月3日至8日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

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的主题是：“毛泽东同志是否仍留在前方指挥军事作战？”王明及其跟随者把两项帽子戴在毛泽东的头上，指责在土地问题上犯有“富农路线”错误，在军事问题上“游击主义”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是王明蓄谋已久的诡计，以便夺取兵权，把枪杆子夺到自己手中来。用《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的话来说：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坚持9月26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中央局一些成员，根据临时中央历次指示，批评前方“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上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把他5月3日复电中对临时中央的反批评斥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

王稼祥心中明白这一切，他准备在这中央局宁都会议上主持正义，维护毛泽东。面对项英宣布共产国际的指示，宣布毛泽东在土地、军事两问题上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开除前委军事领导职务，调至后方政府工作，而大家默不作声，之后，有人说同意，又有回声，不反对。王稼祥忍不住站起来发言，他说：“红军有今天之日益壮大，革命根据地有今天的巩

固和发展，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不可分的。目前，我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富农政策是符合革命的要求的，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不同意调毛泽东同志于军事领导之外，如果加上这两个错误作为调动毛泽东工作的理由，那是不公正的，我是不同意的，请大家考虑。”人们感到很诧异，居然有人反对共产国际的指示。王稼祥又说：“同志们请想想，我党粉碎敌人的一次比一次强大的围剿，每次敌败我胜，现在第三次反围剿取得了大胜利，即将准备迎击第四次围剿了，此时如果把毛泽东调离军事指挥权之外，那么，谁来接替？谁能接替？请问？”会场对于王稼祥的质问，鸦雀无声，但是谁也惹不起所谓“共产国际”这把尚方宝剑。毛泽东也感到冤屈，站起来发言：“请问大家，我犯了什么错误？事实证明一、二、三次反围剿都胜利了，我不接受处罚，我错在哪里？”大家七嘴八舌批评毛泽东和王稼祥，他俩人不约而同地反驳，只听见一些无知的声高音粗，只见一个个理屈词穷的面红耳赤，会议进行激烈，满屋烟云袅袅，烟尘四散……

毛泽东见此情况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俩处于极少数，我们少数服从多数吧！我只好到后方去工作了，革命不分前方和后方呀！都要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事业。”毛泽东无奈的扫视一眼会场，似乎是有所指，似乎是对所有人。“如果在军事上有什么问题要找我，我一定欢迎！”

周恩来想来是和事的脾气，他承认前方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有等待倾向，但指出后方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他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朱德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

但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这就是人性的无知，对一个屡战屡胜的指挥员居然没有一点客观分析。

毛泽东气愤的说：“中央局不是全权信任，坚决不就没有必要由我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提议中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临时中央常委会在10月6日开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博古批评道：“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同时还强调：“我以为应该做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名字，而与其倾向在党内作积极的斗争，这因为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张闻天表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会议决定，立即去电苏区中央局。会后，毛泽东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毛泽东对向他送别的周恩来、王稼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苏区中央局接到临时中央这个指示电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回后方。留在宁都的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根据临时中央来电，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

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10月26日，临时中央又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33年6月上旬，在宁都再次召开中央局会议时，毛泽东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但博古作的结论中重申那次会议是正确的，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6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讲到宁都会议，说撤掉军职“是缺席裁判，并且不通知”，这完全是一种“高慢的宗派主义”。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红军。

毛泽东就在这个多事之秋，到后方做政府工作了。他心中坦然，但又担忧，谁来代替？谁来当作战指挥员？

王明在莫斯科通过遥控高兴地撤下了眼中钉毛泽东，正寻找目前代替毛泽东的职务的人。他想了一个妙法，坐在恩师米夫屋内与米夫商量，只见两笑相迎，两嘴嘻的合不拢。

“米夫同志！你能同意我的意见，就更好办了，有了我们派去的军事顾问，毛泽东也不敢反抗了！我们就可以实行我们的‘御敌人于大门之外’，‘堡垒对堡垒’，攻打大城市了……”王明那个开心呀，

居不知“共产国际”这把尚方宝剑差点断送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

米夫频频点头：“你不必说下去了，我无法不同意你提出的意见，我双手赞成。”以王明的地位和权力，及其宗派集团的势力，不难获得苏联国家军事机关的允许。批准之后，王明马上派了一位名叫李德的德国人到中央苏区，成了王明的代理人。



1933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八县贫农团代表会上

毛泽东在10月中旬抵达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在院长傅连璋安排下住进老古井医院休养所——一栋两层的花园小楼房里。他一到医院，就去探视在这里分娩的妻子贺子珍。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生下一个男孩。产后没几天，她因为吃了不干净的蔬菜，得了中毒性痢疾，人瘦得剩把骨头。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把自己的姐姐找来，专门照顾贺子珍。

在她产后的第十四天，毛泽东从宁都来到长汀。他立即到医院探望贺子珍，见她身体这样不好，很是忧虑。当天，毛泽东就在离福音医院不远的一个叫老古井的地方住下来。

第二天，毛泽东手里提了个瓷罐子又来到医院。他把盖子打开，贺子珍看到，是一罐热